

〔美〕丹·考德威尔 著

玩美苏美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

论美苏关系

——1947年至尼克松、基辛格时期

〔美〕丹·考德威尔 著

何 立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Dan Caldwell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1947 to the Nixon-Kissinger
Grand Design
Greenwood Press

据美国格林伍德出版社 1981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马 可 铮
封面设计：冯 光 美

论 美 苏 关 系

——1947 年至尼克松、基辛格时期

〔美〕丹·考德威尔 著
何 立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北京通县科技厂排版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7.25 字数：181,000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900

书号：3003·1698 定价：1.1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的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的分析。作者把1947年至1976年期间分成了尖锐冷战时期(1947—1962年)、有限缓和时期(1963—1968年)与缓和时期(1969—1976年),分别研究了这三个时期中美国与苏联的外交政策行为以及两国在各个领域建立起来的指导双方行为的规范。作者并通过对一些具体的事例——如裁军谈判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苏美贸易谈判,古巴导弹危机与中东十月战争——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些规范的建立及其得到遵守或遭到违犯的情况。作者还综述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为美国外交提出的总构想与总战略,比较了这一总构想、总战略与冷战时期的总构想、总战略的不同之处,剖析了其失败的原因。作者对战后国际关系的某些观点,当然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作者所进行的探索与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4
第一部分 1947—1976年美国 and 苏联的政策与规范	
第一章 冷战时期的政策与规范	12
第二章 有限缓和时期的规范	44
第三章 尼克松—基辛格的总构想和总战略	65
第四章 缓和时期的规范	92
第二部分 事例的比较研究	
第五章 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谈判和限制战略 武器会谈	120
第六章 1958—61 年和 1971—74 年的苏美 贸易谈判	151
第七章 古巴导弹危机和十月战争中苏美对危机的 处理	172
第三部分 结 论	
第八章 美苏关系和尼克松—基辛格的总构想与总 战略	203
后 记	222

前 言

本书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是叙述 1947 年至 1976 年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危机处理、经济和战略军事问题领域内的相互影响；二是分析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系而制订并贯彻一个总构想和总战略的尝试。

本书分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叙述美、苏两国从 1947 年以来为处理各个实务领域中的利害冲突而创立的程序、规则和机构，或各种规范。这一部分还对尼克松—基辛格为美国的新外交政策所制订的总构想和总战略进行了分析。要而言之，前四章提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美关系的一个概貌。

第二部分运用结构式的、集中的比较方法，在要分析的三个问题领域中，从尖锐冷战时期和缓和时期各选一个事例，加以比较。本部分对这三组相对应的事例进行了分析，以考察在尖锐冷战时期和缓和时期苏美两国在处理危机、军备控制和经济问题领域中的外交政策行为之间的类似之处和区别。

第三部分为本书结论。这一部分对所探讨的三个时期和三个问题领域中苏美两国的外交政策行为的区别进行了估价。同时也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处理并鼓励美苏相互依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所达到的程度作出评价。

关于资料来源的一点说明

就诸如苏美关系和尼克松、福特、基辛格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做法这样近期的和有争论的问题进行著述，在材料的收集和解释方面是会引起某些问题的。有关这些问题的苏联政府的文件，能得

到的微乎其微；美国政府的许多文件也仍然是保密的。然而，鉴于这是些十分突出的问题，利用可以获得的尽管是很零碎的材料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还是很重要的。

随着美国的政府报告和备忘录的销密，或者如果可能，在能够得到苏联文件来进行分析时，本书所作的某些解释和假设无疑将不得不加以修改。不过，我相信，在可以公开获得这些另外的文件以前，我已经查阅了目前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材料，从而对苏美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对苏态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我利用了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的演说、文稿和回忆录；美国国会有关美苏关系、缓和及军备控制问题的听证会纪录；历史学家、政治学者和记者所写的第二手材料；美国和苏联出版的有选择的原始材料；和我对前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成员进行的一系列私下采访的纪录。

鸣 谢

对前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官员和外交分析家所进行的45次采访，极大地加强了本书。在有些情况下，被采访者允许我说明消息是他们向我披露的；但在多数情况下，我不得不同意对采访内容保密。我要感谢那些接受我采访并向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内部情况的人。

斯坦福大学的亚历山大·乔治仔细地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意见。我对他给我的帮助和鼓励的感激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充分表达的。罗伯特·基欧汉、亚历山大·达林、沃尔特·克莱门斯和约翰·洛弗尔也阅读了全部底稿，我对他们提出的许多意见和批评表示感谢。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阅读了本书的一章或几章并提出了意见。我要向巴顿·伯恩斯坦、理查德·科塔姆、保罗·马朗茨、亨利·纳乌、罗伯特·诺思、约翰·奥尼尔、威廉·波特、丹尼斯·罗斯、

托马斯·特劳特和劳伦斯·韦勒表示谢意。

1977年，设在首都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学者国际中心的国际安全研究计划主办了一次讨论会。我把本书第七章的初稿提交给了那次会议。在会上，罗宾·埃德蒙兹、约瑟夫·克鲁泽尔、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和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对初稿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国际安全研究计划主任塞缪尔·小韦尔斯和威尔逊中心主任詹姆斯·比林顿允许我在1977年7、8月间在这个中心工作。我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我还收到了理查德·黑德上校、詹姆斯·金和罗伯特·温兰对该论文提出的有益的意见。

一些单位支持过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对于斯坦福大学军备控制和裁军计划的成员及该计划的主任约翰·威尔逊·刘易斯所给予的支持，我要特别表示感谢。世界秩序研究大学联合会和佩珀代因大学教员休假委员会支持过本书的撰写工作，我对他们给予我的帮助表示感谢。在我最后修改书稿期间，佩珀代因大学西费学院的约翰·尼克斯博士和诺曼·休斯博士曾给我以鼓励，我很感谢他们。我要感谢布赖恩·贝克和戴夫·麦考密克，他们在研究中曾从事辅助性工作。

佩珀代因大学的盖伊·帕塞尔、贝蒂·李和文字处理人员主持了本书几个草稿的打字工作，博·考德威尔校对本书的最后稿的清样。我的双亲一如既往地给了我无限的鼓励，我感谢他们这一贯的态度。

我向我的妻子洛拉致以最深切的谢意。她阅读了本书的草稿并提出了意见，使本书有了很大的提高，变得更加明了易读。更为重要的是，当这项工作看来无望完成时，洛拉给了我支持和鼓励。我怀着衷心感激和热爱之情，把本书奉献给她。我们的孩子贝思和埃伦使我不断地感到在生活中有许多比写一本书更为美好得多的事情。

导 论

尼基塔·赫鲁晓夫曾经说过：“国际紧张局势的情况就象一棵卷心菜。如果你把菜叶一片一片地剥去，就会看到菜心。而国际紧张局势的核心就是苏美关系。”^①本书集中论述这个问题的核心——1947年至1976年的苏美关系。国际关系学者在分析苏美双边关系方面已经花费的精力比对任何其他双边关系都多，这是很有道理的。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的生存和幸福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关系的稳定。

已经有人撰写了无数本战后美苏关系史。本书将不采用单纯的历史分析的办法，而是试图揭示三个不同时期和三个问题领域中的苏美外交政策行为的相似之处与区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把战后时代划分为不同的时期。例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冷战划分为六个阶段。^②在本书中，我把从1947至1976年这段时间分为三个时期：尖锐冷战时期（1947—1962年），有限缓和时期（1963—1968年）和缓和时期（1969—1976年）。虽然这样的划分过于笼统，但它却提供了对战后时代苏美关系的起伏进行估价的一种办法。

我并不试图对超级大国的相互影响作包罗万象的分析，而是倾向于将我的分析限制在三个问题领域：危机处理，经济，和战略—军事关系，我作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这是三个最突出的问题领域，本书研究的这三个领域中的美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总的关系的进程。

① 《纽约时报》，1959年5月11日，第3版。

②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冷战是怎样引起的》，《外交季刊》第51卷第1期（1972年10月号），第181—209页。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政治家们已创立了一系列准则和规范来调节两个或更多的参与国际活动的国家之间在各种实务领域和地理区域中的相互影响。这些准则和规范可能有的未言明,有的则很明确。例如传统的均势的规范基本上是心照不宣的,然而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确立的指导国际经济关系的准则则是相当明确的。

规范就是一套准则、程序和(或)机构。创立这些机构是为了处理参与国际活动的国家在共同感到需要进行合作以调节现存的利害冲突或促进相互利益的领域里的活动^①。政治学家海沃德·阿尔克把制度解释为“指导原则体系或者一套能产生成果的因而也是有效的规则。”^②近年来,学者们描述和分析了科学技术,海洋,货币和战略—军事等问题领域中的国际间的规范。^③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还描述和分析了加拿大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双边约定。

建立规范的一个明显的必要前提(但是光有这个前提还不够)是至少两个参加国际活动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各国之间与超越国家的相互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导致规范的发展。本书通过分析苏美间的正式协定和条约、官方声明,以及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实际行为来说明这种规范。

规范的观念之所以成为政策分析的一种潜在的有价值的手

①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实力与互相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77年),第5页。

② 海沃德·小阿尔克:《对相互依存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有计划的研究的一种方法》,《国际组织》第31卷第1期(1977年冬季号),第36页。

③ 基欧汉和奈:《实力与互相依存》;约翰·杰勒德·拉格耶和厄恩斯特·哈斯合编《技术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国际组织》特刊第29卷第3期(1975年夏季号);戴维·冈珀,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理查德·加温 and 约翰·巴顿:《核武器和世界政治:未来的各种可能性》(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77年);和西翁·布朗,尼娜·科内尔,拉里·费边和伊迪丝·韦斯·布朗:《关于海洋,外层空间和气候变化的规范》(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77年)。

段,有几个原因。第一,规范的观念使分析家们得以集中力量研究特定的问题领域里共同确认的准则。过去,国际关系学者们往往过于强调整个体系的准则而忽视了问题领域的准则。第二,分析不同问题领域中的规范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准则是如何建立和维护的。第三,规范的观念会帮助政策制订者弄清原先往往被人忽略的有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和方法。

尽管规范的观念在政策分析方面具有潜在的效用,然而这个观念目前却还未得到充分的说明。一些分析家对规范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要末认为这种规范是存在的,要末就认为它们并不存在。近来运用这一观念的分析家(基欧汉和奈、阿拉克)提出了三层的区分:无规范,准规范和规范。虽然这一区分法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分析家们还应力图作出更细的区分。应当加以说明的特征包括如下各点:一、规范的类型——该规范调节的是什么实务活动;二、范围——该规范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公开的还是私下的;三、该规范是心照不宣的还是明确的;四、该规范是局部的还是全面的?一旦完成了对不同特征的规范的分析,就有可能最终创立一种关于规范的类型学,它既有理论意义又与政策有关。这样一种类型学的建立,将既有助于解释规范的发展和变化,又有助于促进规范的建立、扩大和发展的努力,如尼克松和基辛格所做的那样。

本书第一部分除了叙述苏美间的经济、危机处理及战略—军事规范的进展外,还描述和分析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为拟订和实施一项美国的新外交政策的尝试。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就职时,曾发誓要结束越南战争和寻求一种新的“和平结构”。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想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处理美国外交政策的种种问题,而是制订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总构想和实现这一体系的总战略。总构想就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期望他们的新国际体系最终达到的状态;而总战略就是实现新的国际体系的手段。在他们的总构想中,尼克松和基辛格看到了美国、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一种三角的实力结构。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总构想和总战略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们向中国靠拢……以造成一种全球的力量平衡。这不是为了勾结起来反对苏联，而是为了使我国获得一种能实现建设性目的的平衡地位——让每个共产党大国在和我们搞好关系中都有重大利益。这样的平衡可以确保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主要大国之间保持稳定，甚至最终实现合作。^①

在他们执政的前四年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他们每年的“世界形势”报告中概述了他们的总构想和总战略。然而他们从未充分阐明过他们期望他们的新国际体系最终达到的状态。他们倒是强调了正在进行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一个被称为和解的进程）和同苏联建立更良好关系（一个被称为缓和的进程）的进程。

七十年代初期，“缓和”是国际关系语汇中使用得最广泛、而又最不被理解的概念之一。同国际关系领域里流行的诸如“民族利益”、“均势”和“国家安全”等其他许多概念一样，对“缓和”的使用是混乱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然而，含糊不清并没有始终把缓和的含义都搞得很朦胧。哈罗德·尼科尔森在他写的外交基础读物中指出，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政治家们一般把缓和这个术语理解为两国或多国之间的紧张局势的缓和。^②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苏美关系中的缓和，实际上始于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当时这两个超级大国逐步在几个问题领域中缓和紧张局势，其中最突出的是处理危机和军备控制问题领域。尼克松和基辛格远远超出了“缓和”的传统的含义。他们使用的“缓和”一词指的是通过在各问题领域中建立规范，从而使苏美之间的相互依赖进一步扩大。

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后的美国总统都面临着一项双重任务：

①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79年），第192页。

② 哈罗德·尼科尔森：《外交》第3版（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

一方面要制订对苏的长期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取得公众和国会对他们这类计划的支持。罗斯福认为联合国的建立及其为安理会中大国协商所作的规定，可以在战后世界对付苏联及与苏联一起工作提供一个大框框。^①但是美苏竞争使联合国机构失去了效能。继伊朗、希腊、土耳其危机之后，哈里·杜鲁门总统提出了遏制主义。杜鲁门和他的顾问面临着使公众和国会接受并支持他的新政策的艰巨任务。^②事实上，在选择和制订一项对付苏联的长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在美国国内存在着许多牵制因素。一项长期外交政策要取得国内支持，一个重要的手段是证明该政策的合理性。^③如果一位总统能够把他的政策建立在美国社会的根本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上，那么要获得对他的政策的一致支持就会容易得多。如同杜鲁门和他的顾问在四十年代中期面对一个新的国际环境一样，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七十年代也面对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本书分析和估价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为证明他们的总构想和总战略的合理性所作的尝试。

第一部分提供了1947至1976年苏美关系的一个概貌，而第二部分则更为集中地分析了在三对相应的事例中苏联和美国的外交政策行为。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强调对事例研究进行系统比较的必要性。^④亚历山大·乔治和他的同事们采用了一种“结构性的集中比较”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分析者准备一套体现这一研究

① 罗伯特·达莱克：《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的外交政策，1932—1945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

②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美国与冷战的根源，1941—1947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

③ B·托马斯·特劳特：《再温修辞学：政治合理性与冷战》，载《国际研究季刊》第19卷第3期（1975年9月号），第251—284页。

④ 西德尼·维巴：《比较研究中的若干难题》，载《世界政治》杂志第20期（1967年10月号）；哈里·埃克斯坦：《宏观政治中的事例研究和理论》，载弗雷德·格林斯坦和纳尔逊·波尔斯比合编的《政治学手册》（马萨诸塞州，雷丁：艾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1975年）；布鲁斯·拉西特：《国际行为研究：事例研究和累积》，载迈克尔·哈斯和亨利·卡里尔合编的《政治学研究探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钱德勒出版公司，1970年）。

的理论方面的标准化的一般性问题。^① 这些问题然后被用于对每一事例的分析。根据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果，分析者修改原先的问题来说明原先被忽视的因素。事例研究的比较使分析者能得出关于他所研究的现象的一般结论，这是以客观环境为基础的。由于这种方法对于分析决策的可变因素十分实用，也由于这一方法有助于发展与政策相关的理论，我在第五、六、七章中采用了结构性的集中比较的方法。

第二部分中我的主要目的在于估量美苏外交政策行为在不同的影响全局的条件下和各个问题领域里有多大程度的差别。为了深入分析这个问题，我从尖锐冷战时期(1947—1962年)和缓和时期(1969—1976年)以及处理危机、军备控制和经济三个问题领域中挑选了一些事例。为了突出美苏外交政策行为的差别，我没有分析有限缓和时期(1963—1968年)的事例。

许多历史上的事例可以作为对“缓和”作结构性集中比较的基础。十九世纪缓和的重要事例包括英法关系(1815—1817年)，俄德关系(1875—1877年)和1898年法绍达事件^②之后的英法关系。然而尼克松、基辛格的缓和观念是指一个建立体系的过程，远远超出了该术语的传统的外交含义，即仅仅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紧张局势的缓和。由于本书主要的中心点是尼克松—基辛格的总构想和总战略，因此我是从二次大战后的国际体系中选择事例的。在选择事例进行深入调查之前，我把我所研究的两个时期和三个问题领域中的苏美相互影响的最重要的事例都列了出

① 亚历山大·乔治：《事例研究和理论发展：结构性的集中比较的方法》，载保罗·戈登·劳伦编的《外交：对历史、理论和政策的新探讨》（纽约：弗利出版社，1979年）第43—68页。

② 英法两国为争夺非洲殖民地而引起的冲突事件。1898年9月，英军镇压苏丹马赫迪起义后，溯白尼罗河南进，与来自法属刚果的法军相遇于法绍达（1904年改名为科多克）。双方对峙，形势紧张。最后法国恐德国乘机进攻，对英让步，于11月撤退。——译者

来。①我根据我的研究计划和目标考虑了这些事例,选择了“表1”所列的事例来加以分析。

表1 为进行分析而选出的事例

问题领域	时 期	
	1947—1962 年	1969—1976 年
经 济	1958—1961年的贸易谈判	1972年的贸易协定
军 备 控 制	1955—1957年伦敦小组委员会的谈判	1969—1972年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处 理 危 机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1973年十月战争

我选择事例时有几点总的考虑。第一,我要选那些其重要性足以涉及美苏主要决策者的事例。第二,我要选那些能获得其官方资料的事例。第三,我要找互相对应的事例,其中一个是尖锐冷战时期的,另一个是缓和时期的,对这些互相对应的事例可用类似的尺度来进行比较。我对这些事例的探索性的分析使我能找到一些表面上看来相似的事例。

我对事例的选择也受到各事例的特殊因素的影响。1958—1961年苏联之转向西方是它为同西方开展大规模贸易而作出的一次认真的尝试。虽然苏联同西欧各国和日本之间开展了广泛的贸易,但苏美贸易却仍然微乎其微,而且美国冷战时期设置的经济障碍大部分直到七十年代初还存在。1972年的苏美贸易协定提出要解决和消除大部分壁垒。因此对这两个重要事例进行系统的比较会有助于了解经济问题领域里美苏政策制订者的动机和行。

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在核裁军的检查和核实问题上存在着根本

① 我分析的事例的清单见丹·考德威尔:《美苏缓和及尼克松—基辛格的总构想和总战略》(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年),第293—295页。

分歧。此外,苏联直到1949年才爆炸了它的第一枚核武器。由于核查问题和苏联拒绝放弃发展核武器,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没有为控制核军备作出过认真的努力。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从1955年到1957年在伦敦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这些谈判是严肃的和实质性的。虽然这些谈判未能产生任何实际成果,但美苏双边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却还是产生了一些重要协议。

正如一些分析家已指出的那样,古巴导弹危机是尖锐冷战时期的终结。这一事件的严重程度只有1948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才能与之相比。它对于促成随后出现的缓和无疑起了一部分作用——如果不是主要作用的话。尽管古巴危机中的利害关系显然不象十月战争期间苏美危机中的利害关系那样重大,然而这一危机却是1962年以后时期里美苏最严重的对抗之一。对这两个事例进行比较有助于理解缓和的先例和缓和对苏美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

本书的结论评价了规范这一理论概念在描述与估价苏美关系和尼克松、福特、基辛格的政策方面的效用。我还分析了这些对苏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一部分

1947—1976 年美国和苏联的政策与规范

第一章 冷战时期的政策与规范

西方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不信任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存在。经过战争，这种不信任更加严重了，而且成了支配 1945 年以后 30 年中大部分时间里的东西方关系的一个因素。战争期间，苏联同其盟国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切，双方都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权宜之计。约瑟夫·斯大林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没有必要地推迟开辟第二战场和拖延向苏联军队运送物资，这是不无理由的。尽管罗斯福认为他能通过个人的魅力来影响斯大林，丘吉尔却不信任这个苏联领导人并怀疑他企图控制东欧。

在二次大战刚结束以后的头两年中，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除美国外，不论战败国还是战胜国都因深受战争之苦，陷入了社会、经济、政治的混乱之中，中国则燃起了内战之火。美国虽在战争中承受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但是战争并未波及其国土，因而它在战争中崛起，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45 年，它占了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

尽管在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享有左右一切的地位，大多数美国人却赞成美国回到其战前在世界上的地位上去。国会一片“让孩子们回家来”的要求所包围。二次大战后美军复员的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1945 年 6 月美军